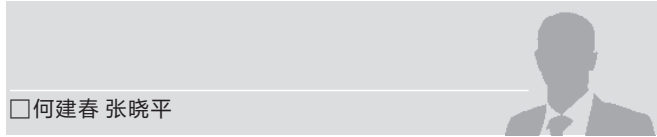


江南河考据(上)



□何建春 张晓平

【摘要】多年来,人们众口一词,江南河由隋炀帝主持开凿于隋大业六年(610)。但据考证,江南河的开凿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六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拓宽、疏浚工程是在唐代,尤其是五代的吴越国时期,而且江南河,尤其是在杭嘉湖水网地区并非是一条水道。

【关键词】江南河;开凿;年代;河网。

编者按:江南河(运河)的开凿时间似乎早有历史“定论”,人们习惯性将其上溯至隋炀帝时期。然而,在这篇洋洋洒洒八千言的《江南河考据》中,作者嘉兴船文化博物馆馆长、嘉兴市政协文史特邀员、嘉兴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何建春提出了质疑,并就此查阅二百多本书籍,投入十余年精力,详细考证了江南运河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轨迹。

时间回溯至2004年,关于京杭运河地图标示的争议引起了嘉兴市港航管理局何建春的关注。本着港航人的初心和对历史的尊重,何建春开始对京杭运河的历史进行研究。2007年,何建春和电视台记者历时三个月调研京杭运河全线。之后,何建春大量翻阅古籍资料,从朝代更迭的运河名称到运河的走向,作了详细而精确的考证,得出江南河“始于春秋,兴起秦汉六朝”的结论。

这篇论文,为江南运河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江南河,既可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即江浙沪等地区的运河,也用来特指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最南段,即北起长江南岸京口(今江苏镇江),经云阳(今江苏丹阳)、毗陵(今江苏常州),绕经太湖东岸的吴郡(今江苏苏州),过浙江杭嘉湖平原的嘉兴等地,到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的运河水道。此前的先秦至秦汉六朝时期,人们通常将人工开挖的河道称沟、渠、渎、道,而宋元以后则常称作漕

河、运河等。

无论是在中国大运河史上,还是在江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江南河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千百年来,江南河不仅曾承担着南粮北运、北货南输的重任,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也直接便利了中国南北的水上交通,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时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中国大运河中通航条件最好、航运最为繁忙的黄金水道,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

然而,多年来,人们似乎众口一词,江南河是隋炀帝主持开凿于隋大业六年(610)。但据考证,江南河的开凿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六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拓宽、疏浚工程是在唐代,尤其是五代的吴越国时期,而且江南河,尤其是在杭嘉湖水网地区并非是一条水道。

一、孤证不立,隋炀帝“敕穿江南河”难以成立

江南河开凿或兴起年代,多年来似乎早有定论。绝大多数的史书、专著以及学术论文等几乎众口一词:江南河由隋炀帝主持开凿于隋代。隋大业六年(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这一独家记载,一千多年来几乎被所有的史书、专著以及学术论文等引用。如江南河沿线各地的地方志的有关记述:

元至元《嘉禾志》:“运河,在县西,南通崇德县,北接吴江界。考证: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拟通龙舟。乐天诗云:‘平湖七百里,沃壤两三州。’谓此水也。”

明嘉靖《杭州通志》:“旧志:隋大业中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拟通龙舟。”

清乾隆《镇江府志》:“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拟通龙舟。”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记述都源于《资治通鉴》,连文字都几乎照搬照抄。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编撰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5),历时19年,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此时与隋大业六年(610)毕竟已相距470多年。

由此,许多人不由心存疑问,为什么没有当时的记载,哪怕是年代更近些的历史记载?

在《北史》《隋书》等官修史书中,对隋代开凿的河渠都有明确的记载: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主持开凿广通渠。《隋书》云:“开皇四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主持开凿山阳渎。《隋书》云:“开皇七年夏四月己酉,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主持开凿通济渠。《隋书》云:“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北史》云:“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七百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主持开凿永济渠。《隋书》云:“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北史》也记:“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然而,从《北史》到《隋书》这些官修史书中,唯独找不到关于江南河的任何只言片语。是《北史》和《隋书》等史书的疏漏?《隋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实,编撰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

较高的声誉。《隋书》中记载的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种史实,其中对隋文帝、隋炀帝等帝王的记述尤为详实,几乎事无巨细,怎么可能遗漏开凿江南河这样牵动朝野各方的大事呢?江南河全长八百余里,其规模虽然不及通济渠和永济渠,但远远超过各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和山阳渎。开凿通济渠组织“河南诸郡男女七百万”,开凿八百余里江南河,怎么说也得需要动用几十万人工。如果是在隋代开凿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动用如此民力,《隋书》没有理由不记述。这只能说明,在隋代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江南河。

据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考证,不仅《北史》《隋书》与新旧《唐书》等官修史书没有关于隋代开凿江南河的任何记载,而且在《资治通鉴》以前的所有正史、野史以及地方志、甚至文人笔记都均未提及(参见《中国运河开发史》第五篇第五章,陈桥驿主编,中华书局,2008年9月北京第一版)。而自《资治通鉴》后,所有关于江南河的记载均源于《资治通鉴》。按照“论从史出”和“孤证不立”的这个史学最基本的原则,《资治通鉴》的独家记载:隋炀帝“敕穿江南河”,难以成立。

二、史料表明:江南河始于春秋,兴起秦汉六朝

既然隋代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或拓浚江南河,那么江南河到底兴于何时呢?

江南河的开凿或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六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胥溪(周敬王五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凿胥浦(周敬王六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形成吴古故水道,沟通了太湖与长江的水道。《越绝书·吴地传》云:“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人扬湖,出渔浦,入大江,秦方广陵”。同时,又开凿百尺渎,沟通了吴国通往钱塘江的水道。“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另外,据《海宁水利志》记载,周敬王三十八年(482),越王句践开挖越水道,即今崇长港,沟通了今桐乡市崇福至海宁市长安镇之间的水道。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钱塘江和太湖及长江之间已有水道相连,舟船相通。

江南较大规模的人工水道开凿始于秦代。吴国开凿的水道,入江口在京口以下,避开了丹阳一带的高地,船只必须在大江上航行相当距离才能进入邗沟。因此,秦始皇借助“望气者”说丹徒(今江苏镇江)有王气,遂“使赭衣徒凿坑败其势”,凿断高地,改谷阳为丹徒,将河口向西移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区),并延长线路,使

之“阿曲”,以利行船,“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接着,又在长水(今嘉兴)“恶其势王,令囚徒十余万人污其土表,以污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掘破原来的河道,使其折向西,并开凿了水陆两条通向钱唐、越地的直达通道,“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至此,北起丹徒,南至钱塘江的人工水道全线贯通,成为江南河的雏形或前身。

西汉时刘濞(前215~前154)开盐铁塘,调节江河之水,方便粮盐运输。武帝时(前140~前87)沿太湖东缘沼泽开浚百余里河道,畅通苏州与嘉兴的运渠。六朝(三国东吴、东晋、南朝之宋、齐、梁、陈)时期,破岗渎、上容渎的开凿使江南水道更加通畅。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吴兴郡太守殷康发民开凿荻塘,引余不溪(东苕溪)、苕溪(西苕溪)之水自乌程(湖州)合流而东至平望,长125里,障西来诸水之横流,导往来之通道(《苕溪运河志》第十八章河道整治工程)。加上,南朝宋大明七年(463)吴兴郡太守在郡城(乌程)东南开吴兴塘,成为运河的重要水道。到隋代时,以苏州为中心,南达嘉兴,北通丹阳的通航水道不仅始终通航,而且在杭嘉湖平原形成至少在三条以上的南北水道,

即由吴郡(今江苏苏州)南下,经嘉兴分流,一路入长水塘沿陵水道,经硤石趋长安,进上塘河至杭州;一路由嘉兴,经石门至崇福,经崇长港至长安入上塘河至杭州;还有一条则是由江苏平望西经震泽、南潴到吴兴郡(今湖州),往南经荻塘、泉溪、雷甸,至杭州;构成了杭嘉湖平原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通航水网。

所以,早在元代就有人对“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提出质疑:“至隋大业中,炀帝幸江都欲遂东游吴会,始自京江开河至于杭。此说不然,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也。盖六朝漕输繇京口泛江以达金陵,则有风涛之险,故开云阳之渎以达句容。而京口固未尝无漕渠也。”(《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镇江漕渠说》)清代曾任河南提学参议的张九徵等人在编撰《乾隆镇江府志》的漕渠词条时,不仅引用了上述这番话,还引用了宋代诗人顾时大的诗《题丹徒漕渠》:“两冈相望山壁立,地形脊高势回漕。练湖寸板虽得尺,废亭泄去如尾闾。自从秦凿兴赭徒,大业广此事邀娱。岁久不治成症瘵,下视一线皆泥涂。”并表明:观此则渠始于秦明矣。

这些历史记载充分说明,江南河兴起春秋战国时期,贯通于秦汉六朝时期,并非始于隋代。